

《繁花》中的上海是我们写过的80、90年代

2018年,一个小伙子和我们联系,说自己在为《繁花》做前期调研工作。他说看很多我们的文章,汲取灵感,也去找我们采访过的人物聊了聊,以拼凑出角色的时代生活背景。我们笑称:彼此的工作很相像。终于,六年过去,《繁花》开播了。我们选取了电视剧《繁花》中的一些片段,来说说真实历史中的那些人事物。



上世纪80年代,吕富强作为外商雇员参加广交会

外企白领与“外事无小事”

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外企白领,已经有了严格的“dress code”(着装要求)。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街头,在两用衫、夹克衫的茫茫人海中,出现了一小群西装革履挤公交车、脚踏脚踏车上班的人。“格辰光冷天屋里厢冷死,到办公室又只好穿衬衫。跑到商社来上班,棉毛衫、棉毛裤脱也来不及脱。”“生活上有交关窘境,相信第一代外商雇员每个人都碰到过。”吴平说。在进入日本九大商社之一——日商岩井之前,吴平的工作单位是一家街道企业。那是1982年,他被作为培养对象,从延中复印工业公司借调到街道团委工作。因为自学过一点英语,当有关部门来为外商选拔人才时,他第一个拿到了录取通知书。尽管来自“上只角”,刚进日商岩井担任业务员时,吴平还是闹了些笑话。“上班没几天,所长让我发个‘telex’(电传),我从来没听到过。”他说。如今80后、90后闻所未闻的电机机,在当时可是先进的通讯设备。通过发送“明码电报”,可以与公司在全球的100多家分支机构联系。零基础的吴平只好请比他早进商社、从外贸公司调来的同事教他,利用吃午饭的时间拼命学习。1982年4月,上海市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服务部成立。外商在上海雇用中国雇员,必须

通过该服务部。原先在宝钢外事处工作的叶兴虎,被市政府抽调到外企服务部工作。国门初开,外商进驻上海,急需聘用中国雇员。然而当时的人事制度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,人从哪儿来呢?最初规定,业务人员由上海外贸总公司推荐,秘书等服务人员由锦江饭店推荐。可很快就无法应对缺口。“每天都有外商机构来要人,但是我派不出人。”叶兴虎回忆说。由于之前的教育断层,要在上千万人口的大上海找到略懂外语的人才,竟然有“踏破铁鞋无觅处”之感。为此,叶兴虎和同事跑去静安区和徐汇区的一些街道选拔人才,后来又跑遍了上海的十个工业区。1983年,当时在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工作的吕富强也通过了选拔。“其实我不大想去,对外商有点陌生。”他回忆说。“我问阿拉师父,没想到他讲:去!这个就是老早讲起来‘吃洋行饭’。依假使待在研究所,到顶也不过只是高级工程师。”国门初开,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思想政治上。像吴平,吕富强这样到“洋行”去上班,当年被看作是“不出国的劳务输出”。“所有雇员都必须按照出国的要求政审。”叶兴虎说,“从隔壁邻居、居委会、派出所到所在单位……一路政审下来要敲十几个公章。”第一代外企白领,都听过“外事无小事”这

句话。每周六下午,外企服务部要召集派遣到各个外国商社的雇员,坐在瑞金路小学的小板凳上,开展思想学习活动。根据规定,雇员的家属不可以和外商一起吃晚饭。“日本人邀请阿拉家属吃饭,我只好跟同事联合起来,伊讲老婆加班,我讲老婆身体不适宜(舒服)。”吴平说。“几趟下来,日本人觉得奇怪了:哪能每趟总归要加班,生毛病?”一直到1986年,吴平打了报告,得到批准后才得以带家属参加公司活动。饭不可以随便吃,礼也不可以随便收。“比方讲外商送我打火机,我不好拿回去,快点奔到管理办公室上交。”吴平说。“所有上交的礼物,到年终颁奖的辰光,可以优先挑一样——只好挑一样。”1984年,吕富强被派遣到三井物产,在收礼这件事上也碰到了难题。“我有根领带,是上海领带厂的真丝‘敦煌领带’,最好的那种。”“阿拉有纺纱部,对着装比较讲究。日本人看到我这根领带,有点屏不牢了;吕桑,我给你根领带,这是日本产的,试试看。”“我敢戴啊?交到管理办公室了。日本人问:为什么不戴?我只好讲:被同学看到拿走了。日本人响,过了两天,又给我一根领带。”“这根不好再交了。我心想,外假使问问我,我就讲:工作需要,啫,戴了嘛。”

《孽债》

《繁花》热播期间,上海人见面多少都会聊上几句剧情。上一次这样的场景,也许还是《孽债》。1995年1月9日,《孽债》在上海电视台八频道开播。当时27岁的年轻导演梁山喜欢在晚上骑脚踏车上街,晚上8点05分,上海的马路上、公交车上几乎空无一人。因为大家都在家里看《孽债》,甚至有饭店把电视机搬到了大堂。“我骑着自行车一路听过去,路边的裁缝铺子、理发店里,传出来的全都是这部片子的主题歌。”梁山回忆说。“这是作为艺术工作者最幸福的时刻。”电视剧《孽债》改编自叶辛的同名小说,由黄蜀芹担任总导演,梁山和夏晓昀担任导演,讲述了5个云南知青的子女来沪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这是一部“现象级”的电视剧,甫一播出即引发轰动。有一个星期的平均收视率创下了42.65%的收视纪录。期间,上海电视台曾播出“群星爱心演唱会”,停播一天《孽债》。尽管事先多次在屏幕上打出字幕说明,但市民们还是急得疯狂拨打电视台热线,说只要当晚播,再晚也没意见。为了满足观众的热情,上海电视台后来不惜损失200万广告费,将每天播一集改为播两集,开了黄金剧场两集联播的先河。在梁山看来,采用沪语对白是这部戏成功的关键之一。“我们模仿的是上海当时拍得最棒的几部纪录片,比如《重逢的日子》、《毛毛告状》等。”他说,“电视剧有表演的腔调,我们想把它去掉。”当时,梁山很推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,它的形式特征之一就是运用地方方言。在尝试用沪语拍戏这个想法上,梁山和他

此后,瑞金大厦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、上海商城等一大批涉外办公楼陆续问世。据说这些写字楼里都有一名“打桩模子”(黄牛)常驻,专门兑换外汇券。



《孽债》中的联谊大厦

联谊大厦

强总上班的联谊大厦,在《孽债》里也出现过——吴观潮上班的地方。1985年5月,拥有当时全上海最好外滩景观的联谊大厦在延安东路落成。这幢高107米、28层的大楼,曾创下多个上海第一乃至全国第一,比如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务办公楼、高度第一大楼、内地第一幢玻璃幕墙建筑……联谊大厦的物业管理公司拿到了上海的第一张物业牌照,从此办公楼的物业管理模式开始在全上海推广。上世纪80年代,上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。据说锦江俱乐部、锦江饭店中楼和南楼几乎全改为办公用房,和平板店、上海大厦等涉外宾馆的一些客房也改为办公室,但仍难满足需求。个别外商不得已“偷租”民宅,开设“地下办事处”。究其原因,上海的办公楼太少。市委市政府研究后决定,合资建设上海第一座涉外商务办公楼。很快,一份建设工程审批文件放到了汪道涵市长的办公桌上,申请人是香港新鸿基证券有限公司、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和上海锦江联营公司,申请内容正是在外滩建造一幢甲级写字楼,名为“联谊大厦”。此前,上海没有任何建造涉外办公楼的经验。为了高质量打造这栋商务楼,建筑所用材料都把关甚严,中央空调、冷冻机、锅炉、日立电梯、擦窗机、监控系统、冷却塔、玻璃幕墙等,均看齐国际水准。大厦竣工半年之前,预订出租率已超七成。其中有三菱商事、丸红、通用电气、IBM、惠普、王安电脑、DEC、花旗银行、ABB、三洋电机、新鸿基等世界知名企业。有些企业排队登记超过一年,方才得以入驻。“在联谊大厦上班”,一时成为年轻人的梦想。



梦特娇

1991年,上海市职工年平均工资3317元,每月平均约276元。刘海文(化名)在1991年买过一件凹凸版的梦特娇,海蓝色,上面有黄色一枝花,他记得价格大约是900元。这个数字,相当于那年上海普通职工3个多月工资。在那个年代,梦特娇短袖T恤还是有点东西的。首先是面料。梦特娇男孩津津乐道的“冰丝短梦(粗袖梦特娇)”,其实是一种人造纤维替代天然丝,对聚酯面料进行多道工序加工后生产出的,这种材料叫“亮丝”。市指几个80后读者都有类似的印象,小时候用手去摸长辈的那件梦特娇,“一碰上去,冰冰凉”,“类似于蚕丝”。其次是款式。梦特娇亮丝T恤大体分为平板、花版、凹凸版。1999年,当时很火的亚新生活广场里,凹凸版亮丝售价680-880元,平板和花版亮丝便宜点,600-780元。最经典的颜色是灰蓝色,有点类似蒂芙尼蓝,其次就是黑色,俗称“黑梦”。大概它家设计师精准领会了那些年梦特娇男孩们内心的需求:蓝色个性张扬,黑色沉稳内敛,反正正调是到位了。“《孽债》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受老百姓喜欢,获得广泛的感同身受,就是那样的生存环境和老百姓的生活太接近了。”



年轻时的刘海文(右二)穿着梦特娇与朋友们合影

“真假梦特娇”升级弄堂热搜,那些斥巨资买过“正版”的梦特娇男孩们,在辨真伪这件事上个个无师自通。最有名的传说之一,就是“香烟头可烫”。刘海文印象特别深,有次同事把梦特娇短T带到厂里来,一帮人起哄要用点燃的香烟头做鉴定实验。那件实验品过不了,“确实阻燃”。一时间鉴真假的舆论实在太多,从材质到走线,从性能到颜色,都能成为大家判别真假梦特娇的切入点。市指读者Edonchen是1981年出生的,他曾留言说:“我大舅从小舅那批发来的梦特娇。”

泡饭

宝总每次去夜东京,泡饭过6个小菜。几十年前,这对上海人来说太奢侈。“阿拉都不要爷娘催,吃得如火如荼,所以软胯都是烫伤的。”他说。大头菜在瓶子里,碗里肉糜、隔夜青菜。你一筷子,我一筷子,充满好胜心的少年们互不相让。等到80后长大,小时候不喜欢吃的泡饭,终究成了乡愁。五六十年代,上海的工人家庭清晨一咕噜起床,把隔夜饭倒入锅,浇上老虎灶泡好的开水,生起煤球炉,滚个几下,一碗泡饭便上桌。再配上小菜,囫圇吞枣下去,短短几分钟内,肚子就填饱了。如此,早上六点钟上班,可以扛饿到中午十一点吃中饭。“泡饭这种餐饮形式比较适合工商城市快节奏的生活,上海人守纪律、重辰光,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。”九十年代,历史学者承载曾访问过普陀、杨浦一带的纺织工人,他们的工作偏重于体力劳动,上班时间严格。“没有泡饭,就没有上海近代产业的发达。”他说。然而,经过“拷贝走样”,泡饭早已不仅仅是工人的专利早饭。不少上海文,也对泡饭充满了感情。上海作家马尚龙,小时后一家七口住在“上只角”淮海路上的霞飞别墅,父亲掌管爷爷的印刷厂,每个月收入150块。照道理说,在六七十年代,这样的生活水平算得上优渥,但要养一大家子,还是有点紧巴巴。物质的拮据如同是给日子拧上了发条,让身处其中的一家人不由得加快了节奏。每天一早六点半三刻闹钟一响,兄弟姐妹们立马你追我赶地起床,走出三十多平的房间,往上踏三个台阶,来到厨房、晒台和卫生间所在的楼层。这时,妈妈已经用24寸大的钢钟镬子把泡饭烧得滚烫了。“么泡饭老烫的哪能办呢?”他说。那个年代上海人民的智慧就在这里了。滚滚烫烫的两碗泡饭盛满,他们把泡饭集中到晒台上去“晾”。冬天的时候,把烤菜露倒入泡饭中,让它迎着西北风吹,便足以加速降温。

天再热一点,在面盆里盛点冷水,把泡饭碗掖在里头,面盆里的水徐徐升温。刷牙洗脸,再回到晒台的时候,泡饭的温度差不多降到可以吃了。“阿拉都不要爷娘催,吃得如火如荼,所以软胯都是烫伤的。”他说。大头菜在瓶子里,碗里肉糜、隔夜青菜。你一筷子,我一筷子,充满好胜心的少年们互不相让。等到80后长大,小时候不喜欢吃的泡饭,终究成了乡愁。80后彭晟杰,小时候是讨厌吃泡饭的。然而,小彭的爸爸偏偏酷爱这道传统早饭,老彭喜欢过糖蒜、姜丝和南汇老家亲手腌制的酱瓜吃,乐此不疲。“老一辈的DNA里厢有吃泡饭的基因。”说起爸爸的脾气,小彭有点“怨怒”,“上海人上班着急的,又做人家,最好前一天留下的剩菜剩饭一记头吃脱。”十几年前,彭晟杰去瑞士卢塞恩学习酒店管理。远在他乡,相继在中、西餐厅实习,他在东西饮食文化的吹拂下,逐渐发现了自已的“上海胃”。“泡饭在我胃里打下了烙印。西餐吃腻了,胃不舒服。”他说。肉肠炒蛋,即高仿版的榨菜肉丝,再过上泡饭,唯一缺的是家的味道。和过去相反,彭晟杰现在只有在周末才有空过泡饭,原因是,他的泡饭是讲究吃法了。泡饭烧烧快来兮,但是小菜的准备,却要费一番功夫,腐乳、虾油露、酱瓜、咸蛋、皮蛋、黄泥螺、烤菜、螺蛳菜、萝卜头、花生……你可能觉得这样过泡饭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了。其实未必,上海泡饭的小菜,也是泡菜文化的精髓。家里过泡饭上的什么小菜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你的籍贯。据说,苏南人口味清淡,爱吃带点甜味的酱瓜;宁波、绍兴人嗜咸,镇江、南京一带的人做酱菜特别考究;高邮苏北这带盛产鸭蛋;安徽人爱搞点辣味;海宁一代沿海渔民多,口味比较重,其斜桥榨菜风行于世。一碗隔夜饭,一壶热开水,几碟小菜。简简单单一顿早餐,你能看出一户人家的底细,城市的过去和上海人的身份认同。难怪,这一碗泡饭生息不息。

光明冰砖

网友评价范师傅直接拿勺子挖着吃的方法为“绝对大户”。因为冰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属于“白富美”。能够追溯的冰砖价格,大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彼时益民厂的冰砖分小、中、大三个规格,分别卖1角9分,4角2分,7角。对于七八十年代工薪阶层家的孩子来说,一般总得有点好事发生,才能吃上一块冰砖。一位名叫马蔺荣的作者在向报刊投稿时回忆说,第一次吃中冰砖是在老妈有张贴花储蓄兑现了2元钱奖金的那一天。而美食专栏作家西城回忆:一旦隔壁邻居看到你用一条毛巾包着一块大冰砖匆匆踏入客堂间,就能猜到你来家了客人,而且不止一个。相对于小冰砖和大大冰砖来说,上海人最熟悉的是中冰砖,简称“中砖”。七八十年代,对于囊中羞涩却想吃中砖的顾客,商店有把中砖一切为二的卖法。此时,上海人对于精确的追求又表现到了极致:为了确保一分二的冰砖大小一模一样,分割冰砖采用对角切的方式,谁都不会觉得吃亏。一公斤装的加仑,在1980年代初刚开始生产时,也算奢侈品,定价8元。相当于当年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的近五分之一。最早,加仑是专供给酒店、饭店的产品,等到弄堂里的人家纷纷买了冰箱之后,加仑也随之进入了普通上海人的家庭。



文/晨报记者 姜天涯 制图/特级首席美编 黄欣

本版为节选 扫码读全文